

二十一世紀宣教網絡—— 寫在《大使命》第100期

羅錫為

後基督教世界的挑戰

今年，到蘇格蘭旅行，在愛登堡尋找一百年前「愛登堡宣教會議」的痕迹，俱往矣！在奧古斯督堡的蘇格蘭教會參加崇拜，除了那位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女牧師外，我可能是最年輕的會眾。愛登堡的幾個教堂，都有約翰諾斯(John Knox)的塑像，也有一間小小的約翰諾斯博物館。

恐怕，沒有太多蘇格蘭人認識這位宗教改革先驅。布拉格廣場上，另一位約翰——約翰胡司(John Huss)的銅像是當地屹立著的地標。遊客如鯽，在銅像前拍照留念。有誰會記得，他是威克理夫(John Wycliffe)的追隨者，一位宗教改革的英雄和殉道者。

在德國沃木斯(Worms)尋找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)紀念碑，在沃木斯會議上，路德曾被傳召，要他放棄宗教改革的出版和言論。著名的"Here I Stand"(這是我的立場)，就是路德在會議上向著羅馬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權貴說的。我從千里而來尋訪這件教會歷史上的大事，可是在沃木斯街上問路，竟然都不知道馬丁路德是何許人也。

曾經是宣教事業的發源地的歐洲，已經步入了「後基督教時代」。美洲的基督教，是在多元主義的沖擊下，節節後退，被推向邊緣。形勢正在轉變中，亞洲在宣教事業的位置，已經不只是宣教工場，而是逐漸成為宣教士的「孕育區」。宣教事業的「搜景窗」(view finder)向西方搖過去，新一代的宣教士，從亞洲出發，福音要傳回耶路撒冷，傳回歐洲和美洲。

宣教的中國冒起

二十一世紀的宣教網絡的重心，正在移向中國。中國已超越美國，成為最多人上網的國家。互聯網被廣泛使用，作為傳播福音、培育領袖和信徒的神學教育及傳遞異象的平台。已經有不少宣教士從中國差遣出去傳福音。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，中國有可能躍登為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國家，到時，會有更大的能力，輸出更多的宣教士，去到世界各地，包括歐美宣教。宣教的中國已經不只是一個理想，或是理念，而是正在實現中。

職場宣教受到重視

自第一次洛桑會議後，職場被列出為宣教的工場。對宣教的新觀念隨之而來，宣教士的身份和工作性質被重新定義，從前稱為「帶職事奉者」，變成「職場宣教士」。宣教工場擴闊了，由本土的工作間伸延到「創啟地區」，以各樣專業的資格，在其中為主作見證，領人歸主。將會有更多的職場宣教機構成立、招募、訓練和差派職場宣教士到那些傳統的宣教士被拒諸門外的地區，從而得著那些「未得之地」。

地方教會發動差傳

地方教會，從來是宣教異象和宣教士孕育的母體。近代威廉克里(William Carey)的國外宣教的意願，最初並不為浸信教會聯會所認同，要由自己的地方教會和幾個志同道合的牧師合作支持，才可成

行。受威廉克里影響，差會紛紛成立，展開差傳史的新頁。

差會的功能毋庸置疑，做研究、牽頭和推動的工夫，沒有人可取代。差會不能沒有地方教會支持，但是，地方教會不單是支持差傳的伙伴，更可以是差傳的主導者。上世紀60年代，鄭果牧師在菲律賓靈惠堂成立差會，掀起了華人教會差傳的浪潮。但隨著超大型教會的出現，地方教會有能力自

己成立差會，差派宣教士上宣教工場。大大小小的教會，差遣訪宣隊或短期宣教隊到宣教工場上，愈來愈多。

當更多地方教會起來，發動差傳，把福音遍傳天下的目標又接近一點了。

（作者為香港第一城浸信會主任牧師，大使命中心香港董事）